

**A Picture Says
One Thousand Words**

建筑 城市 生活

Architecture · City · Living

贺勇 著

—— 图十——

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图千言: 建筑·城市·生活/贺勇著. —大连: 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 2009.1

ISBN 978-7-5611-4562-3

I. 一… II. 贺… III. 建筑-研究-欧洲 IV. TU-8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70217号

出版发行: 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

(地址: 大连市软件园路80号 邮编: 116023)

印刷: 大连金华光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幅面尺寸: 250mm × 250mm

印 张: 9.5

出版时间: 2009年1月第1版

印刷时间: 2009年1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 房磊 武毅

封面设计: 苏儒光

版式设计: 许蓝

责任校对: 于锋

书 号: ISBN 978-7-5611-4562-3

定 价: 128.00 元

发 行: 0411-84708842

传 真: 0411-84701466

E-mail: a_detail@dutp.cn

URL: <http://www.dutp.cn>

A Picture Says One Thousand Words

建筑
城市
生活

Architecture·City·Living

— 图 — 言

贺勇 著

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

序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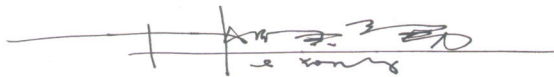
去欧洲之前，找了不少从那边归来的同事和朋友取经：如何才能让欧洲的学习与生活更加充实和深刻？各人都有许多不同的见解，可是无一例外所有人都说：如果有可能，尽量多走一些地方吧！怀揣着这样的秘籍，加上欧洲悠长的假期，于是脑海记忆深处的那些城市和建筑吸引我一次次兴奋地出发，然后一遍遍疲倦可是却又极其充实地归来，而且每次回来后，我都会在地图上圈下曾经涉足的地方，一年下来，偌大的地图竟被我画了个密密麻麻，足迹几乎遍布了欧洲的大部分国家，甚至触及到了非洲。同时，随着数码技术的发展，摄影成为天下真正的“免费午餐”，只要有个相机在手，便让人拍得随心所欲，于是那些记忆深刻的场景化作数万张照片，将我一个专门存储照片的80G移动硬盘几乎撑得爆满。

照片多了，如何分类管理与处置，也颇是个问题。经过一段时间的探索，我将所有的照片分为建筑、城市、生活（人物与场景）三个大类，然后不加类别地挑出自认为最精华的照片放入一个单独的文件夹，如此下来，纷繁芜杂的照片也变得条理清晰起来。有时闲来无事，随意翻看起这些照片，突然发现对它们好像有了一种特别的感情，特别是脑海中有时候进行的一些专业思考，在这些图片中往往能找到最清晰的诠释与表达，那一刻，直白的图片就像一段段通俗浅显的故事，不经意之中揭示出深刻的道理。其实，建筑、城市、生活也是建筑学所关注的基本主题。建筑，是构成城市的基本单位，是承载生活的空间；城市，是人类聚居的形态与场所，塑造、规定着人类的生活方式；生活，是建筑与城市的最终指向，是生命得以延续的形式与内容。从物质世界的观点来看待，建筑与城市构筑起了人类生活的空间和场所，是现代人类文明生活的物质基础。如此想来，这些照片便有了些特别的意义，于是便有了出版本书的初衷。

英语中有句谚语：A picture says one thousand words，字面意思是说一张图片可以表达一千个字的意思，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百闻不如一见，但愿这些图片的确能带给你对于建筑、城市和生活更加生动、鲜活的理解。对于我而言，这是对一段精彩岁月的回忆与庞杂记忆的梳理，因为静下心来发现，那种内心的不安并非源于缺少下一次的旅行，而是一次心无旁骛的潜心静默，从而摒弃那些浮躁与喧哗，使自己的内心得以从容不迫，淡定自然。于人如此，于建筑、于城市又何尝不是这样呢？

也以本书献给我的家人和所有的朋友，愿你们一同分享这些图片以及背后的故事。

是为序言。



2008年4月

于杭州

目录

PART 1 建筑	4
PART 2 城市	9
PART 3 生活	13
PART 4 建筑、城市、生活	15

建筑与城市，表面上看起来只是物质、空间和形态的问题，可事实上它是一本空前宏大的书，政治、经济、文化、人们的价值观念等无不与之紧密关联，并投射到空间与形态之上。所以对于建筑与城市的任何探讨，都不太可能彻底揭示它们完全而真实的面貌，但是在这些错综复杂的问题与现象之中，应该有些基本的原则与态度，而它们将直接决定着我们的建筑、城市 and 其所承载的生活的质量。

以下的文字，写于2007年不同时段，稍加改动后整合起来后放在这里，或许有些零散，但表达着我对于建筑、城市和生活的一些思考和基本观念。

PART 1 建筑

行走在世界各地，参观了众多独具特色的城市和独具匠心的现代建筑之后，其实思考最多的依然是中国的问题，特别是建筑究竟该如何评价？中国特色的现代建筑到底在哪里？自从1998年国家大剧院的设计招标以来，就在社会上引发了关于建筑和城市的众多颇具争议性话题的广泛讨论，随着奥运系列建筑的推出，又掀起了新一轮的热潮。尽管大剧院已经建成使用，奥运工程也纷纷完成，可是争论依然没有丝毫减弱。从这幅热闹纷繁的景象折射出建筑背后问题的复杂以及评判价值标准的不一。站在不同的立场与角度，参照不同的标准，支持者与反对者都可以找到足够多的理由，难以让彼此信服。其实争论并非坏事，也是现代社会发展与逐渐成熟的必然现象，但颇为遗憾的是，自1998年以来这场近十年的纷争，至今依然看不到一些统一、明朗的观点与结论。

一、建筑评价的标准究竟是什么

随着现代社会的快速发展与激烈变动，传统二元明确的“好”与“坏”“是”与“非”的标准变得越来越模糊。就像美国的电视剧《越狱》中所展示的情景，其中无论正反的每个角色都具有多重的性格，他们的所作所为都有其足够的理由和背景，看起来似乎都是迫不得已，没有选择，可是就是这些对于每个角色而言极其正当的行为，却让自己一次次陷入了精神的危机与价值标准的困惑，越来越怀疑自己的所作所为。其实，这些影视角色反映出这个时代的一个基本特征，那就是多义与复杂，建筑同样毫不例外，同一项设计，你可以找到许多条理由加以支持，他人亦可以用更多的理由加以反对，也许，这就是以技术理性为中心的现代主义模式下社会发展的必然与悖论。但是，传统标准的模糊并不意味着讨论的无效，相反更显示出争论与反思、交流与沟通的必要，以期建构新的价值观念和评价标准，从而平衡、指引未来的方向。

“适用、经济、美观”以及系列稍加改变的各种大同小异的阐释，自维特鲁威以来就是被人广为传颂的经典建筑评判标准之一，在当下的中国如何贯彻与诠释，《建筑学报》曾经在2004年数期以笔谈会的形式加以探讨，针对这一观念本身的多义模糊以及当下的困境与解释，那些文章中已有许多较为深入的探讨，这里不再过多赘述，只是以有限的笔墨，论述以下观点：

1. 针对复杂多义综合的现代建筑，难以存在诸如“适用、经济、美观”如此普适的标准，除了结构安全、消防疏散、能源消耗等这些可以完全量化与验算的纯技术问题，难以想象会有国际通用的评价法则或标准，因为概念本身的多义解析、现代建筑的复杂综合、地区背景的巨大差异等原因使得这些准则的具体操作变得相当困难。以“适用”为例，因功能的灵活以及使用者的弹性与差异，很难给出“适用”与“不适用”的明确判断；对于“经济”而言，同样存在诸多困惑，业主的当前资金状况、近期造价与远期维护的平衡，结构、材质的选择与艺术效果的取舍，建筑的投入与建成后的使用频度等都会影

响到建筑的“经济”判断，就像不同的人选购衣服，究竟是买质好价优还是质量一般可是价格实惠的，每个人都会有其自己的判断与选择依据。“美观”更不用说，传统的美学标准多着眼于视觉愉悦的比例、尺度等，可是现代建筑学纳入了城市的向度、生态的考虑、空间与材质的体验以及感官、心理的多重感知等，已经无法用“美”这个单一的字眼来衡量。

2. “功能”与“形式”先后顺序探究的不必要性。形式、空间、材料、结构等是建筑本体的基本内容，笼统而言，谁先谁后、孰轻孰重、谁又跟从谁，实在难以或许根本无法分清，因为建筑最后的呈现与感知终究是以这些部分构成的整体效果。现代建筑的教义之一“形式顺从功能”及其相关诸多言说，均传达出功能与形式的统一这一基本含义。可是建筑是一道多解的方程，同一项功能可以采用不同的形态，同一个形态下又可以包容多种功能，除了少数建筑我们可以仅从外观造型读出它的功能，绝大部分很难判断，就连一些现代教堂，如果不是那十字架的标志，仅从外观也根本无法辨认。

3. 建筑是综合的艺术与技术。因其本身的复杂性，所以很难或者根本无法用几个单项指标加以衡量，以上海金茂大厦为例，单从形式而言，的确令人赏心悦目，那类似中国古代密檐塔的造型，国人更是觉得亲切之极，可是如果以单方造价、维护成本乃至抵抗恐怖袭击的能力等来评价，也许会有不同的结论。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建筑无法评价，只是需要一套相对科学的方法与程序，若以层级法来衡量，那么在评价之前应该建立一个综合的不同层级的指标并给予相应的权重，对于金茂具体案例而言，如果我们从城市总体以及陆家嘴地段等多个层面分析之后，认为形式这一指标具有最重要的程度，那么在进行其他一些指标的判断、加权、平衡之后，我们大概可以说金茂大厦的设计是优秀的。不过，加入了艺术、文化、心理、社会等这些因子之后，建筑的绝对评价几乎是不可能的。

4. 特例的特殊性。国家大剧院、鸟巢、央视大楼等这些建筑都可谓百年一遇，有极其特殊的背景，它们往往包含了更多的政治、文化与精神等内涵，所以也不适合以一般的标准来衡量。诚然，这些万众瞩目的建筑的确具有相当的影响力，所以更应从其特殊性出发进行必要的阐释与分析，遗憾的是，好像看不到该方面的探讨。举一个或许不太恰当的例子，还处于贫困时期的中国人过年时，无论平日多么艰苦，可是大过天的那一天总要大方甚至“浪费”一番，可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一行为就应该大加批判，因那一天所具有的精神与文化意义具有压倒性；从而使之显得极其特殊，所以根本不能用平日的勤俭、节约这些准则来衡量。

5. 关于结构的合理性。这一概念本身的衡量也因具有多重因素而显示出相当的复杂性。以钢筋混凝土结构为例，最合理的应该是跨距适中的简支梁结构，可是我们也会常常采用悬挑或者大跨度这些不是特别合理的结构，以获得更丰富的造型和更合理的功能，其结果使得建造的成本大幅度增加。建筑向高空发展，结构的基本作用就是抵抗垂直与水平荷载等内外力量，在这一过程中，如果说拱券是砖石结构最合理的表达，那么大尺度悬挑、扭曲、变形等自由形体的建构则是现代钢结构的专长，在一定条件下，打破常规的合理性、最大程度地展示材料性能的潜力，将不可能变为可能，带给人们惊奇与想象也是结构的责任与义务，其实也正是在这份对于常规的颠覆之中，人们的视觉不断刷新，建筑的历史得以持续改写，从这一层面出发，一些特定的建筑多花些金钱也是必然的代价之一。

二、再说“中国特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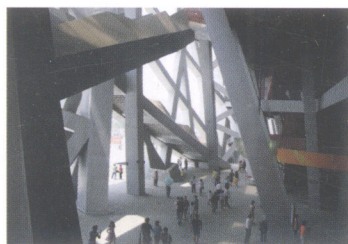
在过去的大约一个世纪里，中国的建筑与城市总是被几个问题困扰着，特别是“传统”与“现代”“民族”与“世界”关系的问题，由此也衍生出众多概念和理论，例如“建筑传统”与“传统建筑”“民族风格”与“民族形式”“形似”与“神似”“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然而，时至今日，依然有许多问题模棱两可，无法回答，特别是究竟什么是“中国特色”，何为“民族形式”，以及它们在当下如何体现等。



金茂大厦远眺



奥运主体育场——“鸟巢”



鸟巢的表皮内部



建设中的央视大楼

综观世界发展的格局，不管我们承认还是不承认，愿意或者不愿意，现代化的发展范式正席卷全球，成为绝对的主导。于是，在日益发展的制造、生产以及便捷交通体系下，我们每日享受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商品，中国也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商品进出口国之一，在享用和生产这些商品的过程之中，我们也许会想到特色，但一般绝不会联系上中国特色，即便中国的汽车实现了国产化，但是无论外形、还是内饰或是核心技术，也没见谁打造出了多少“中国特色”，相反，而是千方百计地想纳入国际统一的标准与模式之中。可是对于现代语境下的建筑，我们却始终无法释怀，坚信一定有一个“新而中”“既传统又现代”、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建筑，将之定为我们当下的目标与方向。可是遗憾的是，几十年的实践表明，除了建造出一些有着变了形的大屋顶、深挑的檐口、简化的斗拱、马头墙、柱廊、清砖加灰瓦等模式化的“中国特色的现代建筑”之外，再也难以出现新的突破，面对如此尴尬境地，究竟是建筑师们江郎才尽，还是目标本身的虚无与误导，而使之成为一项根本就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诚然，建筑不同于普通商品，因为它往往与文化和精神融在一起，从而使问题变得复杂。在文化与精神的层面，基于我们经济落后的事实，必然导致强烈的危机感和不自信的心理，于是将“古”与“今”“中”与“西”长期二元对立，在这一背景之下，“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成为了一种最自然的选择，可是中国文化与精神发展的现状让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进行怀疑：这一策略真的可行吗？当代新儒学大师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就明确提出：“我主张彻底抛弃‘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种简单、二分的思维方式。因为如果单纯中学为体，中学就变成无用之体；单纯的西学为用，西学就变成无体之用。在这种情况下，西方将自由、平等带进来，如何把中学的体、用和西学的体、用进行平等的对话，是我们的大课题¹。”著名社会学家金耀基也指出：中国社会文化在根本上是一个“社会变迁”的问题，因此，他主张超越“古”与“今”“中”与“西”的二元对立，而以“现代化”的一元观来取代中西二元性的紧张²。又有学者指出，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有着结构性的差异，由于对现代化的误解，使得中国建筑文化的问题始终难以向现代化转换，从而导致诸多不必要的争论和矛盾，并认为应以现代化的景观为基础来建构中国现代建筑文化的根本指向³。从数十年的建筑实践的总结、反思，以及诸多有远见卓识学者的思考，我们有足够的理由来怀疑既传统又现代或既现代又中国这一评价当代建筑的双重标准。

建筑是人类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产品，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类型。以文化的四层次说来判断，应该归为物态的层面，以此反观中国当下建筑与城市的困惑与纷争，基本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其一是时间上的文化传承问题，其二是空间上的文化协调问题。文化传承关乎城市与生活发展轨迹的延续，文化协调则是如何平衡不同风格之间的对比与冲突，欧洲对此早有成熟的经验：前者将不同时期的建筑与街区成片保留与维护，后者则通过城市公共空间与景观设计来实现，实践证明这是卓有成效的方法，至少他们从来就没有我们如此惶恐不安的丧失城市特色的危机感，当然，这也与他们长期相对均衡、稳定的发展模式有关。不过，再看我们的城市，一方面大规模成片地拆除老的街区，另一方面又在新建筑上不断地穿鞋戴帽、粘贴符号、演绎传统，以期创造或挽回城市特色，如此舍本逐末的方法终究只能使我们的城市既不传统又不现代、既不新潮又不中国，陷入不伦不类的尴尬现状。

1998年的夏天，笔者也曾经参与中国大剧院的第一轮投标，那一本厚厚的任务书中的绝大部分内容早已忘记，但是其中的两句话却记忆犹新，是对于方案的要求：“一看就像个大剧院；一看就像个中国的大剧院”。至今还在琢磨：天下真有这样的现代建筑吗？

¹ 彼得·圣吉与杜维明在浙江大学的对话：从文明对话到对话文明，2005年11月12日，浙大永谦活动中心

² 金耀基. 从传统到现代. 台北：商务出版社，1992

³ 徐千里. 从中国文化到建筑现代性——思想的角度和轨迹. 新建筑，2004（1）. P40

三、建筑问题的之内之外

建筑的评价往往着眼于建成后的建筑本身，可是如同世间其他万物，建筑的出现并非顷刻间从天而降，而是均有其特定的背景和过程，在它们最终展现在我们眼前之前，大都至少经过了立项、选址、规划、设计、评选、建造等环节，如果我们将设计与建造归为建筑内部问题、其他划为外部问题的话，这两者之间则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外部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制约甚至决定着建筑最终的质量与效果，然而外部问题决策者的集体与匿名性，往往使其责任难以明确乃至被忽略，从而将所有的罪过都落在建筑师的头上。

再以大剧院为例，暂且把建筑单体本身的好坏优劣放置一边，单从城市公共空间的角度、从笔者的实际观察与体验，大剧院的确给城市及其周边带来了不可忽视的一些影响，不过我也体会到了椭圆形造型的一个优点，就是当真正站在大剧院面前的长安街上时，竟会发现到其传达出的尺度效果远远小于其真实的体量，再加上光亮材质对于天空的反射，于是也并不觉得它显得多么庞大、压抑。不过，如果换个角度，选择如此敏感的区位、建设如此庞大规模的建筑，或许这一决策本身就注定了目前这一城市公共空间的效果，无论它采用何种形式（建于地下除外）。

建筑造价的控制与方案评选的公平是另外两个决定建筑最终质量的关键问题，前者与制度的规范与监管体系的效率有关，后者则取决于过程的民主和透明与否。受多种不确定因素的制约，建筑造价的准确控制往往非常困难，所以建设过程中的投资追加相当普遍，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追加本身无可厚非，关键是看是否有一套决策机制以及理性判断。德国柏林的一栋建筑的故事或许能给我们一些借鉴。1992年，为了收藏、展示希特勒时期一些骇人的恐怖行径，柏林市政府与联邦政府决定共同出资3600万马克修建相关展馆（Topography Terror），并于同年进行了方案征集，结果瑞士建筑师卒姆托（Peter Zumthor）中标，获得了设计权。1995年5月8日，该项目正式开工，之后断断续续地建设，到了2000年却停了下来，因为从前期的施工，业主就已经发现造价大大超过了预算，于是建筑师被要求重现修改方案，新方案提交后经专家评委审核之后，认为达到了业主的要求，切实可行，于是重新开工，为了不使工程半途而废，投资方将造价的上限重新确定为7800万马克这一终极指标，可是在继续施工过程中，业主依然发现不能将造价完全控制在这一目标之中，尽管超的不太多，但是毅然决定将卒姆托的方案完全放弃，于是于2004年彻底停工，重新选用建筑师进行方案设计。2007年8月，在工程最初开工12年之后，我在工地的现场依然只看到一堆杂草，新的方案已经确定，并在工地边的临时建筑里展出，是一个德国本土建筑师的作品，一个低矮的规整方盒子，中心掏了个天井，看起来极其平实、质朴，估计其造价应该会远远小于7800万马克。从这个故事中我们可以读出德国人的严谨甚至死板，可是我们更能看到有多少钱办多少事或者说办什么事最多值多少钱的务实与理性。所以建筑的最终造价大都是业主及决策者的意愿使然，怪不得建筑师。关于建筑投标方案评选的问题，曹晓昕先生已经进行过深入探讨，这里不再多言（详见：ABBS建筑论坛——投标体系的议论.htm，曹晓昕）。

四、外国建筑师在中国项目上的职业操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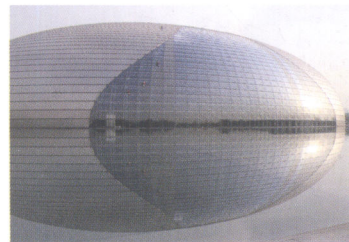
近些年来，一些新奇甚至怪异的方案在中国纷纷落成，有其多重原因：业主及决策者的审美偏好、价值观念、心理需求以及评选标准和程序的不良等都可以纳入背后的理由，但是以此现象来普遍怀疑外国建筑师在中国项目上的职业操守则颇有些不当。以我在欧洲的经验，绝大多数外国人对于中国和中国人并无过多的尊重与好感，但从表面上也看不到任何的歧视与侮辱。在极其重视个人以及事务所声誉的西方传统下，外国建筑师针对中国的项目，很少会特别地轻视，倒是那一次次无结果的投标和十几个小时的长途国际飞行让他们精疲力竭甚至灰心丧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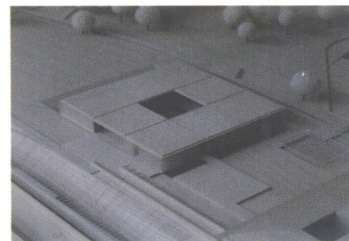
从长安街看中国大剧院



大剧院与人民大会堂



倒映于水中的大剧院



Topography Terror展览馆的最终设计方案

至于判断一个方案是否“一稿两投”，我觉得更需谨慎，绝不可从一张外观效果图就轻易下结论，同一个大模样下，建筑的性质、规模、功能、结构、构造、节点、材料等均可能大不相同，从而导致几乎所有的图纸都要重新绘制，工作量一点都不会降低。在技术的层面，现代建筑着重于建筑的性能，所以外观日趋精致简洁，可是节点的构造却越来越精致复杂，所以对于现代建筑的设计而言，重点和难点更多是在节点的详细设计上，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一个事务所的水准与成败关键。可是也有不少国际知名的大型商业性事务所在全球各地开办着分部，像机器制造产品一般生产着建筑设计，很大程度上就是靠惯用和模式化的空间与形态的语汇再加上通用的节点来完成，如果从这个层面上说，建筑设计的价值和建筑师的职业操守真是值得反思。但是无论如何，我认为外国建筑师针对中国项目并无特别的不良用心。

说到职业操守，我觉得当下许多中国建筑师同样值得拷问，图纸的套用、效果图、模型的虚假成为行业公开的秘密。笔者2006年底曾参与国内某中型城市体育中心的投标，那么大的面积、那么多的场馆，还有老建筑的改造，在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分析、构思、绘图的时间极为紧张，可是提交结果后看到一些大型设计院的方案可谓深入之极，许多场馆都几乎达到了扩初的深度，可是他们自己却说：这种方案好做，只要总图确定，其他几天都搞定了。至于如何搞定，不言而喻，不过针对当下中国的投标情形，建筑师们也有足够的理由说：这是无可奈何的选择。与诸多建筑师的接触与交流，其显示出基于现状的麻木与消极或是沉默与无奈，与现代建筑的中国特色问题相比或许更令人忧虑。

五、未来之路

建筑的评价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结构安全、能源消耗、消防疏散等这些以技术为基础的问题均可以通过量化来进行计算或验算，从而比较准确地衡量是否满足要求，但一旦纳入心理、文化、审美等这些基于感觉与价值观的因子，就使得建筑的绝对优与劣成为一个难以言说的问题，更不可能有一套国际通用的法则与标准，必须依托于具体的基地环境、价值观念、经济条件、使用成员等相关因素，甚至纳入到建筑的全生命周期、使用后评价等才有可能进行相对综合与全面的评价。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对于我国当前一些重大建筑的评价其实还远未完成，任何综合性的盖棺定论式的结论都还为时过早。但无论如何，可以肯定的是某一个或几个单一因子的指标不可能决定建筑的整体好坏，即便是所有的单项因子的得分加权综合之后得分高的建筑也并不一定就更加优秀，因为建筑毕竟是一项综合的技术与艺术，另外，建筑的设计终究是一个理性与非理性混杂在一起的过程，建筑某一方面特色的创造往往意味着另一方面的损失甚至牺牲，所以在设计、决策、评价等过程之中，我们的心态与价值观念则显得至关重要，其实这也是争论的真正指向与意义所在。

以民主、科学为基本特征的现代化发展范式下，个人的创造力以及技术的力量得以最大程度地解放，推进着社会的迅猛发展与变革。西方社会所倡导的高度个人中心主义培植出了契约社会、透明政治以及公共道德等一系列保证社会秩序的制度体系与价值观念。以德国为例，整个社会就像一架精密的机器，每个人都是其中的一个部件，安心地承担着自己的责任与义务，生活也变成一种程式，什么时间做什么事情、参与什么活动、穿什么服装都一清二楚。无论以哪个方面来衡量，他们都是高度发达的现代化社会，可是生活在其中，依然觉得具有浓厚的传统特色，或者说德国特色。西方的实践表明，现代化与地域特色并非对立，但是这份特色，更多是表现于城市总体风貌、人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行为习惯等，而并不是现代建筑本身。

中国特色的问题，将是一项长期存在的哲学命题，之于建筑，需要建筑的内部与外部问题不断改良与完善。当有一天，建筑师们不再整天到处东奔西跑于诸多城市效率低下的投标、汇报，以及效果图、模型、文本制作公司，而绝大部分时间可以安心坐在办公室里分析基地现状、空间与功能、推敲节点构造、挖掘材质的使用可能，当有了这份泰然、从容的心情时，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建筑或许会自然而然地出现。

PART 2 城市

城市景观，并不是花草树木山水堆砌出的美轮美奂。城市景观的意义，在于协调自然、传承历史、抚慰心灵。可是大量的种花、种草，生态就改良了吗？满大街的灰瓦、青砖，历史就延续了吗？无处不在的广场、雕塑，人们就觉得心灵踏实了吗？后工业，既是产业转型的标志，更是人类观念变革的时代，面对新的挑战，我们该以一种怎样的价值观来观察、对待、建设、体悟我们的城市以及其中的一切现象和事物？

一、一段旧闻

2007年1月6日上午7时17分，随着几声闷响，西湖边第一高楼——浙江大学湖滨校区教学主楼向着预定的南面方向轰然倒去，只用了5~6秒的时间，这一高67米、22层的大楼从此就永远在杭州市的版图上消失了，原因是这个地块已经在2005年10月被拍卖给香港嘉里建设(杭州)公司，当时的成交价格是24.6亿元，按照约定，浙江大学要在2007年1月底前把所有的建筑物拆除。

这幢坐落在延安路和湖滨之间的大楼，建成至今13年（1993年建成并投入使用），离西湖只有500米左右，被称为西湖边最高的楼，在建造时就已经有专家和市民认为它对西湖的整体景观造成了破坏，长期以来招致了种种议论。如今，则因它的轰然离去，又倍受关注。

二、争议

一座建成至今才13年的高楼，一座至今仍可使用的高校教学大楼，而今却倒下了！在参与爆破过程的专家眼里：“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的大楼，异常牢固，这次爆破的炸药用量比其他类似的大楼要多出一倍。如果这楼不爆的话，可以使用上百年，非常牢固。”按照设计使用寿命至少100年的大楼，为何用了才13年就面临夭折呢？

争议一：按照正常的规划设计及相关法规的要求，该楼主体结构的耐久年限至少应在80年至100年之间，可其仅仅使用了13年便“命归一爆”，投资成本与使用寿命相比，显然形成了巨大的反差。“短命建筑”所造成的人力、物力、财力浪费是不争的事实。

争议二：城市规划不合理难道竟然就是这座西湖第一高楼短命夭折的一个主要原因吗？按这种思路，我们真的要以爆破拆除、重建城市建筑格局的方式来实现我们理想的城市规划吗？轰然的惊天一爆虽然已经结束，但相关部门真的应该给“西湖第一爆”一个合理的解释。

争议三：大楼在建设及爆破的决策全过程之中，广大公众、特别是众多大楼的直接使用者均处于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之中，他们的要求与情感究竟该怎样弥补？

诚然，这些争议也许永远不会有答案。对于政府而言，将医学院从城市黄金地段置换出去，不仅可以获取土地的最大价值，同时亦可大大完善城市中心商务区的功能，在“发展是硬道理”的指引下，无可厚非。对于浙大，在湖滨校区无法扩展的情况下，将之整合到紫金港新校区之中，既彻底改善了医学院的教学、科研环境，又通过土地出让获得巨额资金，何乐不为？如此看来，这是一场双赢的结局。可是“任何一种选择都意味着另一种无法挽回的损失”（以赛亚·伯林）！那么，在这个过程之中，究竟谁受到了伤害？何者招致了损失？



湖滨校区教学主楼原貌



爆破现场



残留下的大门

三、反思

浙江大学湖滨教学楼其实绝非个案。自2007年新年伊始,高楼爆破声就此起彼伏,先是广州“中国环保第一爆”,接着是杭州“西湖第一爆”,跟着是青岛“楼层最高第一爆”,这三个“第一爆”在吸引国人目光的同时,也引来了人们的质疑:为什么要把这些只有十多年历史的现代高层建筑炸掉?

诚然,城市建设应该有“破”有“立”,但怎样“破”、如何“立”,才能最大限度发挥其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浙江大学滨湖区教学楼的投资成本与使用寿命相比,显然形成了巨大的反差。“短命建筑”所造成的人力、物力、财力的浪费是不争的事实,这也与当下建设节约型社会、走可持续发展的国策背道而驰。另一方面,这一事件也折射出我们针对该类事件缺乏足够的思想意识、操作程序以及制度规范。

当今,对于那些具有历史意义的老房子加以保护和改造利用,已经得到学术界以及政府的普遍认可,甚至许多废弃的老厂房,被许多艺术家改造成Loft式的创意与生活空间,成为身份和品位的象征。但是对于众多普普通通的建筑,因为土地易手或功能转换等原因,而沦为“年轻的老建筑”,它们的命运究竟该如何处置?

反观世界上经济发达国家,其建设大体上都经历了三个阶段,即大规模新建、新建与维修改造并举和重点转向老建筑的维修改造。例如,英国早在1975年,其新建工程数量和费用就开始减少,建筑维修改造的项目逐年增加,1980年建筑物维修改造工程就占到英国建筑工程总量的三分之二;瑞典建筑业上世纪80年代首要的任务是对已有建筑物进行更新改造;在美国,新建筑业开始萧条,而维修改造业兴旺发展。美国劳工部在2000年就曾预报:旧房维修改造业将是最受欢迎的九类行业之一。

再仔细看看诸如浙大湖滨教学楼这样的“老建筑”,有太多的理由加以改造:

其一:**结构与空间上的可行性**。在参与爆破过程的专家眼里:“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的大楼,异常牢固,这次爆破的炸药用量比其他类似的大楼要多出一倍。如果这楼不爆的话,可以使用上百年,非常牢固。”另外,框架与剪力墙相结合的结构体系,可以使其空间重新任意分割,从而满足多种新功能的需求。

其二:**经济上的节省**。上世纪80年代后,英美的统计数字表明:总体上再利用的建筑成本比新建同样规模、标准的建筑可节省20%~50%的费用。上海莫干山大饭店就是一个很好的实例,对其不是推倒重建,而是改造再利用,所耗费用比新建同等水准的酒店节省一半。

其三:**能源上的节约**。建筑业是能源消耗的大户,我国生产建材的耗能占全部耗能的25%,建筑在建造过程中总是耗费大量的资源,产生大量的废弃物,而利用旧建筑改造的消耗相对来说则小的多。

其四:**生态上的贡献**。那些面临拆除命运的建筑一旦更新再利用后,将为良好生态环境的维护做出贡献。建筑在建设与拆毁过程中均产生大量的建筑垃圾,其中绝大部分不能回收利用,对环境造成很大的压力。据统计,我国目前的建筑垃圾已占到城市垃圾总量的30%~40%,这个比例远大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水平(英国16%)。

其五:**文化价值的延续**。建筑是有生命的,对既有建筑的改造利用,既是合理的,也是可行的:既可实现其经济价值的转移,又可体现其文化价值的延续;既是对历史的尊重,也是对未来负责。

其六:**社会价值的导向**。大力提倡旧建筑的改造利用,是普及资源高效利用、关爱地球、关爱全人类价值观的有效途径,也是建设节约型社会的具体落实。这一方面,政府的导向尤其重要,在类似湖滨的事件中,如果政府有意通过一系列的激励措施加以引导,也许结果会大不一样。同时,政府的决策也往往导引着科研的方向,它将促进在建筑更新过程中的立法、设计、施工和改造等多个方面进行深入的研究,同时有益于在全社会培植资源节约、适度消费的价值观念。

当然,也许会有人说:湖滨事件有大财团为这一切买单,政府不但没有损失,反而获了利。非也!

因为财富尽管属于个人或集团，但资源却是人类共有！站在全人类以及未来子孙的立场上，谁也没有浪费的权利。或许，有人说，我们建筑的整体发展水平还远未达到西方的第三阶段，所以还未到大规模旧建筑改造利用的时期。的确，我们还正处于高速建设阶段，但是基于我们迥异于西方的资源与人口比例，我们更是不具备高消费的资格。另外，浙江人均GDP在2006年就已经接近4000美元，遥遥领先于全国平均水平，更应在此方面做出榜样，因为它将对其他地区具有重要的先导与示范意义。

四、我们需要怎样的记忆

换一个角度，我们也许会发现，“双赢”的结论其实是基于可度量经济的盘算（例如投入、产出），还有可以具体感知的功利的考量（例如设施与环境的改善），可是，如果我们将之置于社会与人文的标尺之下，或许完全会是另外一番景象！

据报道，当听说这里要被爆破拆除后，很多曾经在这里生活的人们纷纷回到现场，拍照、录影，留下最后的纪念；很多杭州市民路过这里也都情不自禁放慢了脚步，看上最后一眼；医学院的数位老教授甚至早早地就租借了马路对面宾馆的房间，以一种极为复杂的心情迎接大楼的最后时刻。

前身由1912年6月1日创办的浙江医学专门学校和1945年8月创设的国立浙江大学医学院合并（1952年2月）而成的浙江医学院，几易校名、校址，多次沉浮，历经沧桑，在近一个世纪的光阴荏苒中，数万学子从这里走出去，开启自己救死扶伤的崇高事业，亦有无数老师在此默默耕耘，奉献着自己的青春。校园的一草一木，都早已经融入了他们的记忆，更别说校园的一幢幢大楼。

医学院尽管在异地不断发展，但往日那些承载着无数故事的场景从此消失，那些老一辈的追忆、年轻人的憧憬也瞬间变得无所依托。除此之外，那原本依托于学院周边的商家也大多被迫转行或搬迁它处。其中许多经营者或是人到中年，或是事业刚刚稳定，突然间又要重新开始。那住在附近的老人们习惯了饭后到校园里散步，一下子因校园的消失竟茫然无措……

是啊，在近一个世纪的过程中，这个校园已经深深融入了城市，成为无数人的集体记忆！这份记忆，是那样的朴素、自然，以至于在大多时候人们甚至察觉不到，可是在不经意间，它对人的触动远远超过苏堤、断桥！

我们可以想象，三五年之后，曾经的校园会矗立起一片环境宜人、设施一流、气度非凡的商务中心，可是对于大多数百姓而言，也许除了一声惊叹，难以牵动他们更多的情感。再经过一段不太长的时间，这块土地上曾经发生的故事也许将会从这个城市居民的记忆里永远抹去！当然，在这段时间里，我们也许会修复更多的名人故居，会重建更多的历史场景，会整理出更多的记忆文本，但是对于生长、生活、工作于斯的人们，他们自身的记忆未必会因此而变得饱满充盈！

城市需要记忆，更需要真诚的记忆！

这样的记忆，才鲜活动人；这样的城市，才温暖人心！

五、“幸运”的天星码头

我们承认，城市在发展过程中拆旧建新，在特定条件下，局部甚至整体搬迁，都是必需的，也是合理的。我们也不再纠缠于校园该不该搬迁，楼是否应被炸，是穷所迫还是富使其然，决策过程是否合理等这样一系列难以理清的问题。在这一切已经无法逆转的情况下，我们希望能以一种务实平和的态度来探讨究竟可以以何种方式来弥补、珍藏、保留甚至传承这一份记忆。

对此，天星码头的事件或许可以提供给我们一些参照。

因城市填海计划，有四十八年历史的香港中环天星码头，于2006年11月11日深夜12时关闭，搬至它



维多利亚港湾

处。港人曾经习以为常的沙哑的码头钟声，从此成为绝响。为了纪念这个历史时刻，有关部门为天星小轮举行了盛大而富有意义的“慈善告别航”（其所得收入将捐赠给慈善组织）：

那日午夜，香港中环天星码头，五艘天星小轮响起汽笛声一片，发出摩斯密码——长短短短——长短长长——短，即英文的BYE，中文的“再见”。随后，五艘天星小轮逐一启航，驶向对岸的尖沙嘴。1800位市民与百多位嘉宾，借一段10分钟“告别航”，集体表达对外中环天星码头的惜别之情。子夜12时，码头爱丁堡广场上的大钟悠悠响起16下香港市民耳熟能详的音乐钟声，接着是12响报时钟鸣。随后，大钟灯光渐渐熄灭，市民自发组织了告别乐队，奏出爵士蓝调，一些市民听着听着，哭了……

这一刻，整个城市为之动容！这一瞬间，一种温暖弥漫于维多利亚港湾的每个角落！面对此情此景，有谁还能说香港是一个冷漠的都市！

其实，那天的天星码头，一整天都挤满了为它送别的人，15万市民与游客自发来此搭船，为见证香港半个世纪发展的天星码头划上圆满句号。

另一方面，之前市民自发的告别活动已经持续进行了数日，人们在码头爱丁堡广场上拉起绳圈，挂上一句句告别词，既有“你永远留在香港人的心中，愿新码头能与你薪火相传”，也有人政府对拆除中环天星码头表示不满，指称“无视历史，消灭记忆”。

这就是香港，一个有着高度参与公共事务意识的城市，一个文化杂陈的城市，一个包容万象的城市，一个极具魅力的城市！

据报道，码头内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那座面临拆卸的钟楼，许多市民希望能将这个极具代表性的地标保存下来。对于这口大钟是否与天星码头同时“沉没”，香港立法会规划地政署及工程事务委员会在2006年9月21日的一份《搬迁中环天星码头》的文件中表示：就原有铜钟搬迁至新钟楼进行技术可行性研究后，认为此举并不可行，因为缺乏搬迁所需及日后维修所需的新零件及构件。因此，新钟楼会安装全新的铜钟。钟声与原有的相似，而原有的铜钟将会拆下，陈列于新钟楼之内。



香港中环

六、一份梦想

天星小轮的故事令人潸然泪下，但是亦让人感慨天星的幸运与幸福！其实，天星并未从城市中消失，她只是搬迁至10分钟步行距离之外的异地，可她却被给予了一场15万人出席的温馨而浪漫的告别盛典！

反观我们的湖滨校区，如果不是“西湖边第一高楼”的帽子，我估计不会有多少人关注这一事件，更不用说那100多亩土地上早已被拆除的数十万平方米的建筑以及其他众多人文景观。伴着那一声声闷响的，最多也只有几百人守在她的旁边默默地注视。而这个校园对于整个城市的社会、经济与人文影响，绝不在天星码头之于香港的影响之下！

于是，我梦想着官方曾组织过同天星般一样别致的仪式，给予这个大楼以及整个校园一个充满温情、尊严而体面的谢幕！并让这一天成为浙江大学以及整个城市发展史上最悲壮的一页！

我梦想，曾在这里学习、工作的学生、老师以及无数对她抱有怀念的市民，那一刻都能走出自己的三尺房舍，围绕在她的身边，以自己的心灵共同承受那几声爆炸声的重重敲打！

我梦想，决策者在整个过程中都能广纳民意，并采取一些切实的措施，让这片场地上的故事得以传承、记忆！

我梦想，那仅存下来的孤孤单单站立于风中的大门，稍加处理后能够永远地守在这里，作为那一场故事最后的讲述者！

我梦想，在未来新建的建筑中，能够划出一块场地或空间，通过雕塑、图片、模型等方式对这片土地上的故事给予纪念和展示。

可是，这一切，都仅仅只是梦想……

大楼倒下一个月之后，我曾经再次去了湖滨校园，昔日温馨的场所，早已经化为一堆堆砖石瓦砾，静静地躺在那里，远处几个工人和推土机正在进行最后的清理，整个场地空空荡荡，唯有那些高大的树木，默默地见证着那一切。

PART 3 生活

生活究竟是什么？有限的生命到底又该怎样度过才不算枉然？因为长期居于校园，加上同样单纯的朋友圈子，对于许多行业、许多人的生活我其实是不甚了解的。可是作为一个建筑师，始终又在不断设计着房子与景观，构想着其中的活动，观察、想象着人们在其间的生活轨迹与态度。每当设计一个场所景观时，总会有几个问题冒出来，诸如到底布置些什么设施、究竟有谁会来使用等。当使用对象无法预知时，设计往往沦为构图的游戏以及设施的凭空堆砌。有时即便知道使用对象，也由于缘自设计、建造者的主观预设与喜好，所期待的活动也会成为一厢情愿、从未发生的事情。例如每个学校都有那么一两个露天小剧场，可是我从未看到过真的在上面上演戏剧活动，大多时候反而成了老人们练习太极拳的场地。

如今，看看国内的大学里，活动真是丰富阿！校园歌手、班级风采、书画摄影等目不暇接，打开电视，超女、好男、模特大赛看得你眼花缭乱，可是像我这样的普普通通之流，既无好身材可秀，又无任何才艺展示，于是总觉得这些活动与己无关。据我的观察，事实上大多数人也从不参加类似的活动，尽管这些活动多着眼于“提高修养，提升能力”，于是在这层表象的丰富与繁荣之下，对大多数的凡人而言，这些活动反而有可能变得虚假而单调起来。

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活动来愉悦地填充我们的闲暇生活？活动的定位究竟是培养精英，还是娱乐身心？活动的目的是关于教育、修养、能力，还是开心、放松、友谊？

我所在的德国校园与城市，各种活动的信息也是贴满了报纸和网络，但他们都干些什么呢？挑出几个，或许对我们颇有一些启发。

一、广场菜场

Maria广场是Freising的市中心，1000平方米左右，四面被五六层的建筑围合，南边与主街的道路毗连，如同欧洲绝大多数老城区的广场，在其正中除了一根顶着圣经故事里人物雕像的柱子外，便空空荡荡，连一棵树都不愿意种植。可是广场上的活动却并不单调乏味，上午总有几个流动售货车停在那里兜售一些特色食品，下午以及傍晚则在各个角落摆上了活动座椅阳伞，人们坐在那里悠闲地享受啤酒咖啡，到了周末的上午，这里更是热闹非凡，附近的农场主带来了他们新鲜的蔬菜瓜果花卉等，将广场布置成立琳琅满目的菜场，人们提着筐子、牵着孩子，在穿梭排队等候之中，拉着家常，彼此问候，在阳光的照耀下，那些物品看起来鲜嫩诱人，人们的脸庞也更是红润精神。

二、露天电影

在国内时，露天电影还只是停留在童年的记忆里，一把蚕豆、一个板凳或是一捧稻草，那时对于战争片无比地热爱，电影中每当出来一个人，我的第一反应总是：这家伙是好人还是坏蛋？



玛利亚广场上的周末菜场



慕尼黑工大校园的露天电影

正当露天电影淡忘之时，没想到在这边却碰了个正着，而且一放就是一个星期。那一个星期里，校园的一块台阶状的草地上，每到下午6点多钟就开始播放音乐（或是有人表演），供应啤酒，这时人们陆续地到来，三三两两，晒着太阳，喝着啤酒，听着音乐，很多人带来了防潮垫，有几个会享受的人居然搬来了沙发躺椅。夜色渐黑，一些人在玻璃盏里燃起了蜡烛，身边的空间顿时光明浪漫起来。10点钟，太阳终于落山，电影准时开始。德国的音响也并未见得多好，时不时发出些噪音，可是观众却看得聚精会神，并不太介意。

三、啤酒之夜

慕尼黑的啤酒闻名世界，所以这里的人当然不会少喝了。这边的学生宿舍分成4组，布置在校园的各个方向。春夏秋冬、一年四季，每组宿舍每个季节都会轮流举办一个啤酒节，8块钱买个杯子后新鲜啤酒任你狂饮，同时会有乐队表演，酒后你可以伴着节奏尽情地舞动。喝啤酒是人人都爱都会的事情，所以这里的学生大都会参加，直到喝得酣畅淋漓，东倒西歪。不过最终他们都会记得把杯子带回家珍藏起来（杯子上有标记的）。对了，这些活动大都是每个宿舍区的学生领导们自己组织，搭舞台、买啤酒、请乐队、布置坐椅，全部自己动手。

四、共进午餐

这里的食堂，都只供应午餐。午餐时间，学生老师们也大多在学校里，于是食堂成了一个重要的交流场所。这边的大学，为国际学生每个月都组织一次共进午餐的活动（各自付账）。吃饭总是要吃的吧，食堂中午总是要去的吧，吃的时候不但能见识新朋旧友，还能参与一些轻松娱乐，所以这样的活动很难想象会有人拒绝。

五、跳蚤市场

我曾居住的Freising小城，每周末都有一个跳蚤市场，每次都在不同的地点，有着不同的主题，所卖的全都是二手物品，用过的衣服、鞋帽、书籍、装饰物、生活用品等应有尽有。很多孩子伴着父母守在摊位前，一起参与物品的整理和销售，不过许多东西也少有人问津，甚至一天也卖不了几件，可是参与其中的人们却看起来欣然享受，乐此不疲。

其实，类似的活动还有很多。综观起来，这些活动都与技能、才艺、修养无关，都是出于绝大多数人的日常生活所需，顺随亲切，真实自然，可是在这份平淡质朴之中，却成就了一种生活态度，一种情感沟通。在这里，景观也毋需服务于多么宏大的主题，亦不必多么新奇的创意，只要创造必要的设施与条件，给予这些活动开展的可能与方便。



玛利亚广场上的下午咖啡座



Freising小城的跳蚤市场

PART 4 建筑、城市、生活

如果非要在建筑、城市、生活之间找出一条共同的法则，我以为非“真实”莫属了。真实，是我们应对一切事物的基本态度，摒弃浮躁、臆想，基于真实的背景与需求，做出审慎而理性的抉择，我相信建筑、城市、生活会变得更加自然、和谐，或者至少让人看到变得更加自然、和谐的希望。

一、“Warum”——为什么

无论是生活还是学习、工作中，德国似乎很爱说的一个词就是“Warum”——为什么？所以有个学生说，这里的设计做起来也简单，就是回答一个个问题。问题答完了，设计也便结束了。在国内，我们也尝试以问题为导向的教与学，但问题在于以何者为依据与判断标准提出问题？问题与答案，其实应该同等重要，或许有时候我们甚至会觉得一个好的问题胜过其绝妙的答案。

别的方面我不太肯定，但他们在景观设计的层面提出问题的缘由还是可以清晰感知的，那就是对于现状的深入挖掘，以至于一沟、一坎、一木都不放过。没有理由？对不起，先停下来，继续寻找。所以这里大一点的项目从立项、设计到施工，往往都需要极长的时间，大规模的推倒重建更是稀罕的很，当然这里面也有产权、法规等多方面制约的原因。所以这里的城乡大多执著地延续着既有的风貌和结构，这里的设计也少有超大手笔、天马行空、空中楼阁式的奇思幻想。在德国人眼里，“养眼”也许根本不是基于视觉的美轮美奂、动感时尚或超炫酷毙，而是其内在合理结构的完美品质，就像汽车，样子可能土气，可是性能却优良无比。

二、拉兹的故事

前两天，读到丁一巨和罗华写的一篇文章，讲述我在德国学习时的指导老师——慕尼黑工业大学建筑学院拉兹教授（Peter Latz）中标杜伊斯堡风景公园的过程，可以令我们感受一下德国建筑师的工作态度与方式。摘录如下：

当杜伊斯堡市政府于1989年决定要借国际建筑展东风把位于该市北部、面积为230公顷的旧工业废弃地作为参展项目，为该市居民兴建大型景观公园时，建筑展组委会做了一个十分谨慎而明智的决定：举行一次特别的北杜伊斯堡景观公园概念的国际竞赛，即在65个报名参加竞赛的小组中（其中50个德国本土事务所和15个国外事务所），选出5个规划小组（其中3个德国小组、1个法国小组和1个英国小组），组委会为其提供充足的经费和技术支持，而5个参赛小组成员必须在地调研半年，这期间小组成员与有关专家，如生态学、植物学、社会学、建筑学、工业史专家等共同对这一地区进行了非常细致深入的本底资料调查，并定期与当地居民进行对话交流，在此基础上再向组委会提出公园的设计理念，获胜者做实施方案。

这次竞赛到方案阶段实际上是法国景观设计大师拉索斯（Lassus）和德国景观设计大师拉兹（Latz）之间的较量。拉索斯坚信自己稳操胜券，其方案的确有新意，他利用法国园林的象征手法，把公园分成3个部分，每一个部分反映某一特定工业发展时代的景观特色：即工业化前的田园景观、工业化景观、后工业化景观。其他3个小组的方案则颇为传统保守，两个德国小组用传统的英国自然风景园手法；英国小组方案带有强烈的法国巴洛克风格。拉兹小组似乎不动声色，始终在研究一张景观结构图。方案后期，拉索斯派手下人员去拉兹小组打探“军情”，看到的还是这张抽象的景观结构图，这就更激发了法国人的干劲，拉索斯小组拼命画了很多精美的局部效果图。在1991年春公布的竞赛结果，是拉兹小组获胜。拉兹教授这位密斯·凡·得罗的崇拜者，深



杜伊斯堡风景公园



杜伊斯堡风景公园